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 第二辑

主编 ◇ 滕星

教育与族群认同

——贵州石门坎苗族的个案研究 (1900-1949)



张慧真◎著

民族出版社

教育与族群认同

——贵州石门坎苗族的个案研究
(1900-1949)

张慧真 ©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与族群认同:贵州石门坎苗族的个案研究 / 张慧真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7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105-10164-1

I. 教… II. 张… III. 苗族—少数民族教育—研究—贵州省
IV. G75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7384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mzcbs.com>

北京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8.375 字数: 220 千字

印数: 0001-1500 册 定价: 20.00 元

ISBN 978-7-105-10164-1/G·1744 (汉 804)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 010-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010-64211734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总序

教育人类学是由教育学和人类学相互交叉而形成的一门综合性边缘学科。国外教育人类学学科形成于 20 世纪中期，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形成了以德国、奥地利等欧洲国家为代表的哲学教育人类学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人类学两大流派。在文化教育人类学流派中，又可以划分为主要由人类学家组成的教育人类学理论学派和以教育学家组成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学派。

欧洲哲学教育人类学学派主要注重于从人的本质、教育的本质、人接受教育的需要性和可能性出发，从哲学的高度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人类学中的教育人类学学派，继承了英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框架、概念与田野工作方法，并用其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学派则从英美文化人类学那里继承了“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并将其与美国的“土特产”——美国社会民族理论相结合来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其最初目标是为了捍卫以少数民族为代表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其长远目标是想通过教育改革构建一个不分族群、社会阶层、性别、年龄、身体与智力差异的、乌托邦似的国家与全球多元文化社会。

美国的文化教育人类学研究的范围主要包括少数民族教育（含

移民教育、土著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①等方面。

进入 21 世纪,随着国际上对全球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样性、文化差异与机会均等、多民族国家中主流民族与少数民族、国家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关系的讨论;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来临,人们对教育与社会弱势群体倍加关注,教育人类学也随之成为社会与学术界瞩目的一门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

中国教育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领域,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对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研究一直被冠以“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简称“民族教育研究”,其学科则被称为“民族教育学”,鲜有称为“教育人类学研究”或“教育人类学”的,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首先,这是由于人类学这门学科作为西方的舶来品,在 20 世纪初中期被引入中国时,产生的名称概念上的不统一,以及后来人类学在中国发展历史的影响。20 世纪初中期,人类学在英美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体系;在欧洲大陆的德国和苏联则将人类学称为民族学。当时的学界泰斗蔡元培先生赴德国进修民族学,并将民族学这一学科概念首先引入中国,尽管后来的人类学家吴文藻及其学生费孝通、林耀华等人先后将英美的人类学这一学科概念引入中国。但是,50 年代初的大学院系调整、民族识别工作、少数民族研究,以及西方英美人类学被称为“伪科学”,而苏联的民族学则占据着统治地位等历史的原因,使中国人类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只能仅以民族学替代文化人类学这一学科概念。当前,在西方人类学体系中,民族学基本上作为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下的一门分支学科。而目前在我国的学科分类上,民族学被划分在法学门类下,而人类学则被划分在社会学门类下。

^① 西方的多元文化教育概念一般指少数民族教育、妇女教育和残疾人教育等社会弱势群体的教育。

同一门学科被人为地划分在截然不同的学科门类中，以致人们在学科概念上的混淆。

其次，中国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一直是以少数民族教育为其研究对象，尚未以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扩大关注汉族的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故一直以“少数民族教育”、“民族教育”和“民族教育学”加以称谓。

最后，由于该学科领域的许多研究人员对国外教育人类学学科的历史与发展，以及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并不十分了解，导致他们对教育人类学与民族教育学学科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十分清晰。当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并带有争论的学术问题，本文不在此加以讨论。但是，在此可以以简洁的语言来陈述，民族教育学是教育人类学的一门主要分支学科。

近20年，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走过了与美国教育人类学学科发展头20年几乎相同的道路，即从非学术化到初步学术化的历程。随着中国西部开发，许多国际组织机构、中国政府与社会对少数民族地区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视，教育人类学这门学科必将大有用武之地并因而获得广泛的学术发展前景。在此时，民族出版社推出了中国第一套《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它不仅标志着中国教育人类学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这套丛书可以极大地推动中国西部民族地区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是一套开放性的学术丛书，它肩负着两个主要任务：一是系统介绍与评价国外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二是在批判性继承国外教育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积累与展示中国本土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个案研究的最新和重大研究成果。我们应该提倡走出书斋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去研究当今中国的学校正规教育与社区、家庭的非正规教育。特别关注中国社会少数民族、妇女、残疾人和低社会阶层等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倡导书斋研究与田野工作相结合，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风；推崇

4 || 教育与族群认同：贵州石门坎苗族的个案研究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与理论创新的精神。

我们相信，在教育学与人类学学科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必将进一步推动教育学与人类学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与整合，为教育学和人类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教育人类学，从而为中国的教育改革作出贡献。

滕 星

于中央民族大学独树斋

2001年8月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二辑》主编序言

人类学（Anthropology）是一门全面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它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类群体及个体的文化交流、传承及习得。教育学作为专门研究如何培养人类下一代问题的一门学科，也肩负着传递知识、传播文化的基本功能。这样，人类学和教育学之间就有了天然的脐带，教育人类学也因此成为二者之间有机联系的一座桥梁。

教育人类学（英文名为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或 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是由教育学和人类学相互交叉并通过科际整合而形成的综合性的新兴学科，其核心研究领域是多民族国家的少数群体教育，包括少数民族教育、乡村教育、移民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内容。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教育人类学吸收了包括哲学、法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

教育人类学在国外已有长足的发展；其学科地位早已确立，并对许多国家的教育改革、教育政策、教育规划、教育咨询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我国台湾地区，教育人类学也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与研究。我国大陆地区的教育人类学研究起步较晚，肇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当时研究的重点是异文化和跨文化教育。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大陆地区才开始系统引介西方

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传播教育人类学的基本思想和理论方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教育人类学获得了初步发展，不少学者开始尝试结合西方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教育问题或试图建构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并对此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在新世纪，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教育人类学，2001—2002年，民族出版社推出了由本人主编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一辑。这是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方面的第一套丛书。其第一辑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一辑共有五部著作，分别为：《西部开发与教育发展博士论坛》（滕星、胡鞍钢主编，2001）、《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与教育——理论、政策与实践》（滕星、王军主编，2002）、《族群、文化与教育》（滕星著，2002）、《文化遗产与教育选择——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人类学透视》（王军著，2002）、《文化环境与双语教育——景颇族个案研究》（董艳著，2002）。这五本著作的出版，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和中国西部民族地区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一辑出版五年以来，中国大陆的教育人类学研究进一步取得了如下成果：

一是有关教育人类学的论著重新修订或以系列的形式结集出版，如由冯增俊主编的《教育人类学教程》（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被列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由万明钢、王鉴主编的《多元文化与西北民族教育研究丛书》（民族出版社，2006）；由张诗亚主编的《多元文化与民族教育文库》（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003）、《西南民族文化与教育研究丛书第1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等。国内学术刊物也发表了一批教育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特别是2004年《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推出了由本人主持的“教育人类学”主打栏目，标志着教育人类学成为中国大陆人类学研究领域的主要分支学科之一。

二是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已经由关注少数民族教育逐步扩大到汉族的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许多学者开始从人类学的视角重新检视中国教育问题,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如丁钢主编的《历史与现实之间:中国教育传统的理论探索》(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和《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第1—11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2007);钱理群、刘铁芳主编的《乡土中国与乡村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等。此类研究通过对中国教育进行深入的人类学和文化学的考察,对文化传播、冲突、变迁、整合与教育的关系,以及学校文化、教师文化、学生文化、课程文化以及教育现代化和乡村教育等问题都做出了富有价值的探讨,在一个更广阔的人文背景下促进人们对中国教育进行更深刻的解读。在研究的方法上,这类研究也给教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如丁钢教授大力倡导的在人类学田野工作基础上开展的“叙事研究”。

三是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得到了积极开展,出现了一批具有中国本土意义的学术价值较高的教育人类学民族志作品。如袁同凯博士的《走进竹篱教室——土瑶学校教育的民族志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李小敏博士的《村落知识资源与文化权力空间——永宁托支村的田野研究》(载《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第5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巴战龙博士的《人类学视野中的学校教育 with 地方知识——中国西北一个乡村社区的现代性百年历程(1907—2007)》(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等。

四是以教育人类学研究方法为基础的多学科合作研究课题成果初见端倪,积累了一定的教育人类学本土研究经验以及与国际组织合作开展研究的经验。例如由万明钢教授主持的甘肃藏族、东乡族、保安族儿童心理的跨文化研究及乡土教材的开发与实验研究;由张诗亚教授主持的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教育研究;由孟凡丽教授主持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材开发研究;由苏德教授主持的内蒙古部分地区三语教育实验研究;由郑新蓉教授主持的福特基金会资助项

目“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少数民族文字教材调查研究”；由翁乃群研究员主持的福特基金会资助项目“中国西南农村国家教育的社会文化建构”研究；以及由本人主持的福特基金会资助项目“中国云南省澜沧县拉祜族女童教育”和“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与初中地方性校本课程建构”研究等。

五是大陆教育人类学者开始尝试域外少数民族教育的田野调查，开辟了海外教育民族志和教育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新领域。例如我于2003年开展的对中国台湾地区少数民族教育的田野调查，以及近年来我在美国内华达州印第安人原住民居住区开展的“中国蒙古族—北美印第安人教育文化比较研究”田野调查等。

2002年以来，中国教育人类学出现了注重学科建设，注重在本土经验基础上探讨全球性议题，更加关注现实问题的解决的新气象。与此同时，教育人类学的教学科研机构 and 人才培养模式逐渐完善，学术队伍日益壮大。目前，我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已走完学科萌芽阶段，由非学术化阶段开始步入学术化阶段。

2005年，由本人担任主任的中央民族大学国家“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民族基础教育研究中心”获准成立，这是国内“985工程”高校中第一家以建设教育人类学学科为主要目标的研究机构。该中心力图在“985工程”的实施推动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体系和教育人类学学科体系。在这一背景下，我联合海内外教育人类学研究同仁，经过数年的辛勤耕耘，精心甄选、编撰，目前呈现给读者的研究成果是《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二辑》。《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二辑》一共包括11部著作，分别是：

1. 滕星、张俊豪主编：《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教育研究》；
2. 滕星编：《多元文化教育——全球多元文化社会的政策与实践》；
3. 钱民辉著：《多元文化与现代性教育之关系研究——教育人

类学的视野与田野工作》;

4. 滕星、张俊豪主编:《教育的人类学视野——中国民族教育的田野个案研究》;

5. 滕星著:《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本土经验与学科建构》;

6. 滕星主编:《多元文化社会的女童教育——中国少数民族女童教育导论》;

7. (香港)罗慧燕著:《教育与社会发展——中国贵州省的一个个案研究》;

8. (香港)张慧真著:《教育与族群认同——贵州石门坎苗族的个案研究(1900—1949)》;

9. 滕星、王铁志主编:《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

10. 白杰瑞(Gerard A. Postiglione)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文化、学校教育与发展》;

11. 西玛哈侬(N. Ken Shimahara)等主编:《全球视野:教育领域中的族群性、种族与国民性》。

这些著作中既有教育人类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也有深入细致的田野个案研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当前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研究水平以及国外相关研究的进展。

我深信,《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二辑》的正式出版,对于提升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研究水平,促进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术交流,推动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的学科化和规范化,将产生积极而重要的影响。

滕 星

2008年6月

于中央民族大学独树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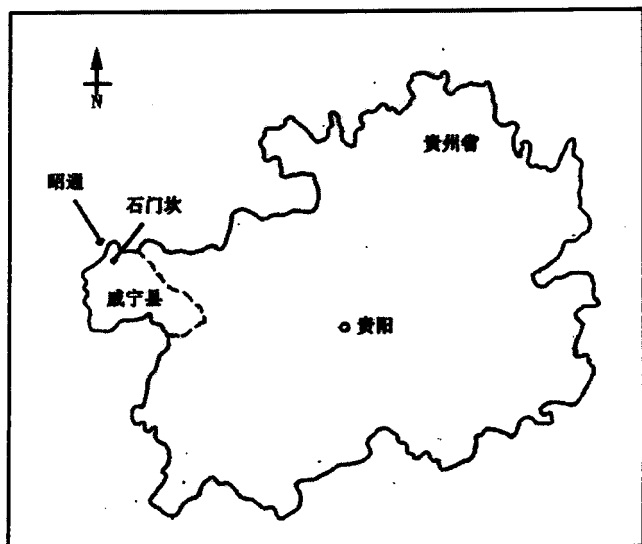


图 1：石门坎在贵州省的位置



图 2：石门坎石梯

(石门坎因这条从河流通往上面村寨的石梯而得名，西方传教士摄于 1949 年前)



图 3: 石门坎石梯
(笔者摄于 1996 年石门坎)



图4：柏格理和早期苗族传教员

(In W. Pollard, *The Life of S. Pollard of China*, London: Seeley, Service & Co. Ltd., 1928)



图 5：石门坎邻近地区的花苗
(1949 年前西方传教士摄)



图 6：朱焕章女儿向柏格理墓献花
(旁为另一死于石门坎的英国牧师高志华墓，笔者摄于 1996 年石门坎)